



本报记者 邵阳

多年前,人们恍然间意识到,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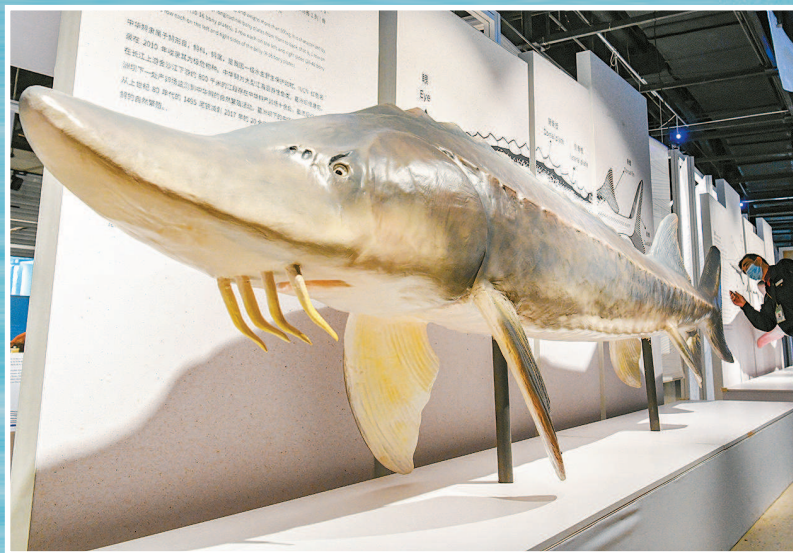
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十年禁渔”,开启了全球大河流域生态保护先例。走过“强基础”的前三年,长江禁渔伴随着新年的曙光迈入了新阶段。不可否认,长江在被治愈,一江两湖连七河,十年禁渔初见成效。可离“草秀故春色,梅艳昔年妆”,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早在2018年就关注到了长江之痛,从《刀鱼之困》背后是长江之殇》开始,就呼吁“断筋子绝孙,护生态环境”;在《禁渔十年“药方”能否治愈长江?》的讨论中,感慨“救鱼,也是在救人”;也在《一别三年 又见鳊鱼》的喜悦中,明确指出长江恢复,“鱼说了算”(见下图)……

长江禁渔迈入了第四个年头。禁渔“成绩单”怎么样,退捕渔民的“新生活”如意吗,新阶段要关注什么新问题……记者多方走访,试图拉直长江禁渔的六个问号。



■ 2020年全国“放鱼日”,上海长江大桥北岸东侧海警码头水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2021年末,上海科技馆主办“大江行地”长江主题科普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鲟、中华鲟等珍稀鱼类模型亮相 孙中钦 摄



■ 2022年8月,长江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下游大江水域逐浪嬉戏 图 IC



■ 2023年2月,松江区多部门开展黄浦江松江段渔政同步执法检查巡查行动,确保禁渔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六问

十年禁渔

迈过“强基础、顶得住”前三年 步入“练内功、稳得住”新阶段

长江初愈 盼从休养生息走向生生不息

一问

2024年是长江十年禁渔的第四年,目前有哪些“看得见”的成绩?

春潮迷雾出刀鱼。曾经,每值清明时节,长江刀鱼上市前后,关于它的话题便在申城大街小巷热起来,而“价格涨没涨”尤其受到关注。

据记载,刀鱼年产量曾高达4000多吨。到了20世纪90年代,年产量也有1000多吨。而在禁捕前夕,年产量下降到60多吨。渔汛缩短到只有三五天,个头也越来越小。

“每年科研人员都能采到样本。2018年至2020年,监测到的刀鱼平均个体体长不足10厘米,平均体重不到5克。”长江口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与保护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长江口联合实验室”)秘书长韩东燕给出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

当生活不再因为“绝户网”戛然而止,刀鱼开始“胖”起来——2021年至2022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刀鱼的平均体长突破10厘米,体重也翻了一倍。而最新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也点出,四大家鱼、刀鱼等资源恢复明显,刀鱼能够溯河洄游至历史最远水域洞庭湖……

二问

禁渔好比是给长江“治病”的重要举措。临床上,医生会根据病症动态调整治疗方案。十年跨度较长,是否需要补充或科学调整举措?

十年禁渔是一场持久战。冲刺“一年起好步、管得住”,迈过“三年强基础、顶得住”,步入“练内功、稳得住”的新阶段,也面临着长江“初愈”后“治疗方案”的科学研判。

“禁渔不是禁鱼。长江传统捕捞业的业态不可持续,这一点毋庸置疑。”潘迎捷指出,然而长江鱼类资源,尤其是经济鱼类的科学合理利用是可以有序发展的。在他看来,在“练内功、稳得住”的新阶段,两个问题绕不开:如何更有利于渔业资源的保护;如何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特别是那些人放天养的生态型优质鱼类。

唐议解释,鱼水相依,鱼少了水

草疯长,水质恶化;反之,鱼多了,水生态失衡,水质同样恶化。过去,一些封闭湖库,每年都会增殖放流,也会回捕相应数量,维持水生态环境。十年禁捕后,放流照旧,捕捞不再。湖泊草食性鱼类过快增长,沉水植被遭遇破坏,湖库降解污染能力反而降低了。

记者了解到,湖北省5个湖库曾于2022年开展生态捕捞试点工作,生态捕捞实行“一湖一策”,有严格红线。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捕捞仅涉及禁捕保护区中的小部分湖库,长江干流,支流依然实施最严格的禁捕政策。

“十年禁渔是调整优化渔业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的重大机会窗口。”

三问

都说“长江禁渔看长江口”,上海所处的长江口缘何那么重要?

“长江口,是能为长江坐诊把脉的地方。”长江口联合实验室水委会主任潘迎捷教授开门见山。

绵延6300多公里的长江,从江苏镇江开始,便进入了三角洲河段。而在江阴以下的河口段,江面不断扩张成喇叭状。从北面的启东嘴到南面的南汇嘴,长江口的宽度达91千米。由江水带来的泥沙进入河口区,经咸淡水交接汇合,发生絮凝作用并引起下沉,于是,又孕育了诸多沙洲。

在长江口,中华绒螯蟹和银鱼在此地产卵繁衍;中华鲟幼鲟、刀鱼和凤尾鱼在这里索饵成长。因此,长江口就是产卵场、索饵场、育幼场,亦是中华鲟等洄游性鱼类的必经通道。

“长江口对于生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对河口主要渔业资源和保护动物的生态功能。”潘迎捷分析,长江口的生态一旦失衡,就像是扼住了这些重要渔业资源和保护动物繁衍生息的咽喉。

四问

渔民退捕、离船上岸转变生产方式后,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了?

“保护长江口的渔业资源,修复治理长江口的生态环境,刻不容缓。”潘迎捷指出,长江口联合实验室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21年春天成立。

韩东燕补充说,实验室成立至今,完成了8个季度的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任务,包括长江口全水域40余个监测站位,共组织出航60余次,已完成了2万余尾的水生生物监测数据报备,“实验室还研发了具备鱼探仪功能的小型监测浮标,解决了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生物资源量的问题”。

五问

禁渔好年是给长江“治病”的重要举措。临床上,医生会根据病症动态调整治疗方案。十年跨度较长,是否需要补充或科学调整举措?

唐议说,十年禁渔期满后如果开放捕捞也会和过去不同,应是组织化的行为、生态型方式,捕捞总量实行配额管理。通过生态捕捞,或有利于湖泊水质好转,同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渔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

“不过,同样需要科学分析渔业资源动态变化,总结生态风险管控长效机制的经验。”唐议补充道,“禁渔后,湖泊的水质生态先好起来,长江支流次之,干流恢复最慢。那么对于鱼类资源的管理,就可以‘反其道’,这是禁渔带来的启示。”

值得关注的是,非法捕捞呈现新特点,尤其是非法捕捞手段由“电、

六问

渔民退捕、离船上岸转变生产方式后,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了?

“长江禁渔,要有将心比心的帮扶!”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廷贵教授如是说。十年禁渔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解决好渔民上岸后的生产生活问题,禁渔才有稳定、扎实的社会基础。

长江禁渔实施后,为确保渔民退捕后的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十省百县千户”长江退捕渔民跟踪调研实施方案》。“长江流域建档立卡的退捕渔民共计23.1万。我们从中选取十个省、每省再选取十个县,并根据性别、年龄、专业等在每县抽取渔民,开展为期十年的跟踪调研。当前在跟踪调研系统的退捕渔民为3881名。”陈廷贵介绍。

很多上海市民听过“刀鱼王”彭海兵的故事。1972年出生的崇明汉子20岁就开始和人合伙做贩刀鱼的生意,后来又自己买船、造船,出去捕捞,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手下有四五十条捕鱼船。前几年他放弃了刀鱼生意,转而成立了“鲟豚使者联盟”志愿组织,变身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志愿者,还协助科研人员开展项目。

显然,不可能所有渔民的转型都能那么妥当。“渔民心里也都有杆秤。”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唐议教授说,“目前来看渔民基本做到了‘退得出、稳得住’,可离‘能致富’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中央和地方累计落实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272.31亿元;沿江约16万名有就业能力和就业需求的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约22万名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021年以来,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西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组建团队,利用暑假对跟踪调研系统中的3881名退捕渔民进行入户调研。“这些渔民来自121个县550多个乡镇,其中灵活就业26.1%,企业吸纳22.2%,公益岗位安置17%,自主创业17.8%……月平均收入3900元。”陈廷贵给出一组数据。

陈廷贵指出,尽管就业率可观,但部分退捕渔民仍面临就业质量不高、经济收入增长缓慢等现实,“有些渔民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除捕鱼之外的其他就业经验和技能。尽管地方政府花大力气开展再就业培训、组织招聘活动,但适合他们的岗位仍然有限。”

不过有一点,陈廷贵感触良多。在入户调研过程中,他对100多位受访渔民提出了同一个问题:还愿意让下一代从事捕鱼吗?没有一个人说愿意。有个上小学的“渔二代”告诉他,大夏天再也不用穿着防水衣了,现在坐在教室里,很开心。

“这是长江十年禁渔‘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生动注脚。”他感叹。

“中华鲟!”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后,几乎所有专家不约而同说出了这个答案。更准确来说,是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鱼类。

长江里的“双白”——白鲟和白鳙豚,已经告别了人类,游入了最深最深的湮灭之河。每每这样的消息传出,万千网友无不表达着痛心和惋惜,“我们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

在渔民代代相传的谚语中,就有“千斤腊子(中华鲟)万斤象(白鲟)”一说,而“灭绝”的结局,似乎像一个黑洞,正拉着中华鲟坠入无尽深渊。尽管地方政府花大力气开展再就业培训、组织招聘活动,但适合他们的岗位仍然有限。

唐文乔介绍,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年维持在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物种名录的“极危”等级,“对于水生生物的保护,仅靠禁渔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像中华鲟这样的河海洄游性鱼类,它的栖息地、产卵场、育幼场的修复,对于物种的保护都不可或缺。”

记者了解到,葛洲坝上游曾有600多公里、20多处的中华鲟产卵场,它们每年会在众多“产房”里选择最合适的。葛洲坝修建后,中华鲟无法上溯,不得不屈居坝下约4公里,不到1平方

七问

长江禁渔“三年强基础”后,当前最紧迫的关注点是什么?

“保护长江珍稀物种的力量和速度,要和它们的灭绝速度赛跑。科学家如果跑不赢的话,物种就灭绝了。”潘迎捷坦言。

更多人正全速“跑”着。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正将生殖干细胞繁育技术用于中华鲟的繁殖研究,以期扩大种群。同时,上海持续开展多年珍稀濒危水生动物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中华鲟、松江鲈、胭脂鱼等珍稀、珍贵物种85万余尾,底栖底栖生物300余吨。

和和保护方向的人才,非常重要。”潘迎捷指出,长江口联合实验室也要“抢人才,上AI”,扩充科研队伍,推进学术交流互动。

长江是一道必答题,回顾十年禁渔的“上半场”,答卷带来希望;展望古老长江江的新一页,鱼翔浅底江豚跃的美景,需要更多人保持耐心和定力,埋头实干。

“长江禁渔的工作是长期的,是大众的,为了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现在正当时。”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